

世纪 之间

来自知识界的声音

李辉 应红



大象出版社

◎ 李辉 应红

世纪之问

——来自知识界的声音
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纪之问:来自知识界的声音/李辉,应红编著.

郑州:大象出版社,1999.4

ISBN 7-5347-2330-2

I. 世… II. ①李… ②应… III. 人文科学-研究 IV. C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9964 号

编著 李辉 应红	封面设计 张 胜
责任编辑 王少卿	责任校对 霍红琴 王森
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)	
新华书店经销	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 850×1168	1/32 印张 14 字数 271 千字
1999年4月第1版	2000年2月第2次印刷
印数 10 001—15 080 册	定 价 21.8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

电话 (0371)5957860—351

世纪之问

李辉 鹿红

世纪之交，百年替换乃至千年替换仿佛在一瞬间。

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走过这一瞬间。

蓦然回首是一种状态。静悄悄，伫立历史窗口，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起伏跌宕，似乎就那么无声无息地闪过。所有的观察，所有的感受，都融入一种平常心态之中。无所谓激动，也无所谓惊奇，更谈不上为亲临百年之交、千年之交而觉得生命多了些什么。多少次世纪之交早在前人面前匆匆走过，他们并不曾因幸逢世纪之交而使生活多出一些内容。平时怎样度过，此时同样如此。世纪之交，其实与每一年的更替一样，没有多少特别之处。太阳仍是那样升起再落山，月亮仍是那样圆了再缺，缺了又圆。这一次当然不会例外。

然而毕竟是世纪之交。毕竟是一个能够让人感触万千浮想联翩的世纪之交。

1998.11



而我们,在这样的时刻,感到时间的分量格外沉甸甸,感到有那么多的世纪之问让人困惑,让人思考。

我们想寻问。

在我们看来,寻问永远是走进历史走进思考的最好方式。一个世纪有那么多的辉煌与黑暗,有那么多的伟大与渺小,有那么多的明确无误与困惑,足可以让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回望,来思索,来一次个人的告别——却又不仅仅属于个人。

个人的寻问,个人的思考,进而个人间的对谈。不必包罗万象,不必左顾右盼,甚至双方都在寻问。永远是寻问,没有答案,没有结束。即便寻问之后仍然留给自己无法解答的疑惑,也只能如此。因为我们看重的本来就是寻问的过程。寻问、对话才能加深思考,才不至于一阵热闹一阵欢呼雀跃之后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,就那么匆匆走过,甚至地上连一个脚印、一片落叶都没有留下。

何况,寻问本身难道不也可以视为一种答案?寻问是思考的载体,对谈者思想的火花,也就有可能照亮蕴含其中的答案。

因此,在“世纪之问”中,我们选择了一些在我们看来与本世纪有关的历史、思想、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话题,分别与某个被选择的对象——学者、专家、作家等——进行个人间的对话。我们相信,来自知识界不同的声音,会呈现日益深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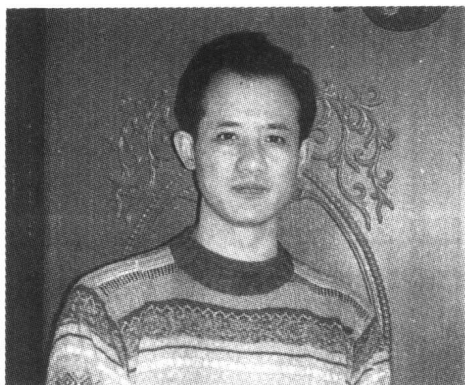
和多样化的历史思考的现状。这将帮助人们认识即将过去的世纪,更加清醒和从容地走进新的世纪。

我们更愿意读者会与我们一样,以一种特别心情,来聆听这些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在思考历史、审视现实时发出的不同声音。

“世纪之问”会是一次个人的最好的世纪告别。希望如此。

1999年3月,北京





李辉



李辉

1956年出生于中国湖北随县(今随州市),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,获文学学士学位;1982—1987年在《北京晚报》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,现在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担任文学副刊编辑,主任记者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著述有《文坛悲歌——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、《风雨中的雕像》、《沧桑看云》等。



应红



应红

浙江宁波人。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编系。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编辑、记者。后在中国作家协会《文艺报》工作至今。副编审。以散文创作为主,出版有散文集《我眼中的风景》等。

目 录

001

王元化

“五四”再认识/关于历史反思的思维模式与方法

基督教家庭与清华学风——再认识的必要性——中外思想、
文化的交融——时代背景中的鲁迅——改变理论的偏识现象——
激进主义之忧

035

邵燕祥

精神与人格的重构/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轨迹

由旧到新的转换——“洗澡”与“过关”——尊严、个性以及人
格萎缩——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——历史场景中的身影



073

王晓明

现代化这把双刃剑/关于知识分子与现代化想象

现代化想象的历史脉络—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困扰—如何创造出新的想象和实践—面对市场经济的焦虑—三点思考—关于民族主义情绪

111

雷颐

突变与渐变/从近代到当代的历史衔接

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—义和团的悲剧与民族主义的偏颇—改良与激进的历史评价—透视社会细微而潜在的变化—接受历史教训才能有所进步—史书与民间修史

147

朱学勤

两种反思、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

/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态度

跳出原有模式与格局—技术操作与知识批判—需要更高的境界—自由派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

185

何清涟

“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”/关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

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传统—以常识理性来解读现实—经

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角色与作用——什么样的“陷阱”？——道德重建与规范化——神话破灭与文化传统的制约——世纪眺望

229

徐友渔

历史研究不能留下空白/关于红卫兵与“文革”

留下空白是一种悲哀——反思虽痛苦却又无法躲避——冷静看当年——从显赫转为沉寂，再到沉思——在历史的环节上

259

陈思和

永远的困惑与误区？/对教育现状的忧虑与质询

心绪万端说高考——教育到底为什么？——北大与现代教育的国家精神——教会学校、民办学校及其他——教育者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僚？

289

林贤治

凝望一个伟大生命/鲁迅与我们，与未来

生命力——历史深处——毛泽东与鲁迅——“心事浩茫连广宇”——鲁迅已成为一种传统——悲剧性，一个永远的话题？

331

蓝英年

镜子中的历史/百年间苏俄政治、文化与中国

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——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、影响——高

尔基与斯大林—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—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—走出阴影

371

李 锐

忧虑三峡/关于治理中国大江大河的另一种声音

三峡工程构想的由来—漫长的争论—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—长江与黄河防洪的不同特点—令人忧虑的泥沙、泥石流—“回眸一笑百病生”

409

阮仪三

夹缝中的传统/城市建设的两难困境

千城一貌何其尴尬—抢救古城的传统遗韵—建设性的破坏令人担忧—忽视文化是一种历史退步—痛心后的执著



王元化



对“五四”的再认识，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。十七、十八世纪的启蒙先驱者，将任何问题，不管是宗教的、自然的、道德的，都要摆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认识。如果不经这个过程，如果不重新再认识、再评价那些已被自己接受的既定观念，那就根本谈不到启蒙。这是我对“五四”进行反思主张新启蒙的由来。今天不是简单地完全按着“五四”的道路走，“五四”未完成的任务应当继承，但是“五四”思想需要深化，而不是重复，这是我对“五四”再认识的原因。



王元化

湖北江陵人，生于1920年，中共党员。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后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，曾任《展望》杂志编辑。1949年后历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、上海作协副主席、顾问等。抗战初期开始发表作品。主要著述有《走向真实》、《文学沉思录》、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、《清园夜读》、《思辨随笔》、《清园近思录》等。

王元化：

“五四”再认识

——关于历史反思的思维模式与方法

◆李辉◆王元化

1. 基督教家庭与清华学风

- ◆：我想找不同方面的人士，就我所感兴趣的、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比较重要的历史、文化、思想诸方面的一些专题做一系列对话。我希望您能结合自身的思想学术发展道路，谈一谈对于“五四”的看法。在谈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是否可以先围绕您个人的经历谈一谈。
- ◆：可以。
- ◆：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前不久才知道您的家庭背景是一个基督教家庭。您父母都是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。
- ◆：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，我小时候也受过洗。
- ◆：但您后来成为了共产党员，与基督教还有什么联系吗？
- ◆：自然不再信教了。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。
- ◆：我在与陈思和谈中国教育问题时，我们谈到对近、现代史上



的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研究还不够,所以我觉得中国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应该加强,过去仅仅把这说成是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的侵略,未免太简单化了。

- ◆:这样说是不是太妥当。我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,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,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。当时的圣公会和长沙的长老会是支持辛亥革命的,沙市的圣公会曾帮助成立日知会,这是一个带有维新色彩的团体,创办了书报展览室和分班授课的学校,这所学校就以美鹏命名。由于日知会支持孙中山,还发生过一位教士被清廷逮捕杀害的事情。黄兴参加基督教就是在沙市,这些情况我没有听父母说过,还是最近读陆淡林的《革命史谭》才知道的。
- ◆:二十世纪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,文学史上不少著名作家出自教会学校,有的甚至受过洗礼。像冰心、老舍、林语堂等。您的学术功底与教会学校也有关系吧?两个姐姐都是燕京大学的,还有一个妹妹是圣约翰大学的。
- ◆:我中学读的是教会学堂,读大学时已经抗战了,我参加了救亡运动,读的大学不是教会学堂,而且我也没有读完大学。
- ◆:您认为您是否受到基督教的影响,具体在哪些方面?这容易回答吗?
- ◆: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,那恐怕就是《新约》中的基督教精神吧。西方十九世纪的作品,无论是俄国的、法国的、英国的、德国的……大抵都浸染了这种精神。这些作品是我喜



爱的。这一点,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日伪统治时期说到过:“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,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,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。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。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。浸透着人文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,几乎成了我当时的惟一读物,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。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,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。”直到今天,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最喜爱的读物。解放后,我没有在文章中谈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,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。我谈到过的是莎士比亚、费尔丁、狄更司、白朗底姐妹、果戈理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、巴尔扎克、罗曼·罗兰等,自然还有许多我喜欢而没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,也大多是十九世纪浸染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。

- ◆:您自小和父母生活在清华大学,我看材料说在巴黎的美术家熊秉明小时候跟您在一起,他是比您大吧?
- ◆:是的,我曾谈起过这件事。后来一位友人告诉我,有人见到他问起,他说他那时太小记不得了。我那时虽然比他大两岁,但也只有七八岁。我们都住在清华园的西院,他父亲是熊庆来。不过,我在清华园经常一起玩的童年友伴倒不是他,而是住在南园时的一些小朋友,他们是李广诚先生家的增德、华妹,马约翰先生家的启伟、佩伦,赵元任先生家的如兰、新那,梅贻琦先生家的祖彬、祖彤,虞振镛先生家的佩曹、佩兰,杨光弼先生家的大田、二田等。那时王国维的儿子也